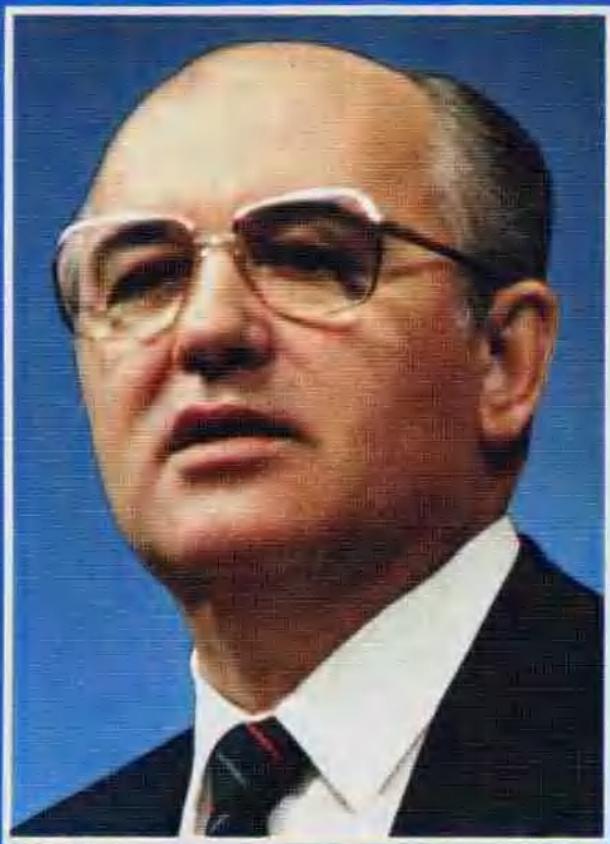


米·戈尔巴乔夫



十月与改革： 革命在继续

米·戈尔巴乔夫

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

苏共中央总书记在1987年11月2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七十周年的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新闻社出版社

1987·莫斯科

亲爱的同志们！

尊敬的外宾们！

1917年十月革命的那些不可忘怀的日子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正是在那些传奇式的日子里开始了社会进步的新纪元，开始了真正的人类历史。十月革命可称为人类的真正的“凯歌之日”，它为人类带来了曙光。十月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为了人的解放和发展而进行的革命。

七十年，这在世界文明多世纪的进步史上是短暂的一刻，但就其创业的规模来说，我国在伟大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历程是史无前例的。以开拓者的步伐一往直前，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精力、知识与能力献给争取十月革命的思想与目的胜利的事业，这本身就是无上的光荣！

周年大庆，这是值得自豪的时刻。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许多最严酷的考验落到我们的肩上。我们光荣地经受了这些考验。不只是经受了这些考验，而且把国家从破坏与落后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它成为强盛大国，改造了生活，彻底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在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斗争中，我们争得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捍卫了自己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另一点，就是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劳动和斗争继续对世界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就是对当代人的政治与经济、社会领域与思想意识各个方面，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周年大庆，这是应当怀念的时刻。怀念那千百万对我们共同

的社会主义成果作出了贡献的人们。怀念所有那些炼过钢铁、种过庄稼、教过子弟、发展了科学和技术、登上了艺术高峰的人们。悲痛地怀念所有那些为了保卫祖国而捐躯疆场的人们，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社会换来往前发展的可能。以往的经历与走过的道路都不可忘怀，因为正是这一切创造了今日的现实。

周年大庆，这是需要思考的时刻。 我们的事业与命运往往是不很简单而又有多种涵义的。英雄的与悲惨的事件，伟大的胜利与痛心的挫折——什么都有过。这都需要思考。我们对70年来紧张的建设工作的思考，是以人民的立场为出发点的，而我们的人民随时准备为了对生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而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和挖掘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潜力。

周年大庆，这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有分量的和意义深远的。过去的成就是未来业绩的可靠基础，也是社会继续发展的基石。我们正是把发展社会主义和发挥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思想及实践看作是当前各项工作和所关心的问题的实质，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与道义上的责任。而这都促使我们一定要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对十月革命后70年来所作的一切，作一番严肃而认真的分析。

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开拓者的道路

同志们！我们所走的开拓者的道路是艰难而复杂的。对它进行简短而又全面的分析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这条道路上，有旧世界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的沉重包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外来武装干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又有各项改造中的新颖事物、人们对改造所寄的希望，以及新生的、不习惯的事物闯入生活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使人往往没有时间回顾与深思。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在革命风暴的历史时期一向起着特殊作用的种种主观因素。也有充满革命时期的极端主义而又往往被简单化、直线化了的对未来的设想。也有为新生活而奋斗的志士们想把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快些、好些和公正些的那种一片真心与满腔激情。

以往的一切——无论是英雄业绩，还是冲突矛盾——都不能不使当代人们激动。我们的历史只有一个，它是不可逆转的。无论它激发什么样的感情，它总是我们的历史，它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我们今天缅怀十月革命那些震撼了整个世界的日子，并且从中寻找并找到坚固的精神支柱和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确信，十月革命对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

人类历史进展的客观逻辑本身引导我们走到这一境界。无论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么矛盾重重和多方案性，十月革命是劳动人民多世纪以来为争取自由与和平，争取社会公正，反对阶级压迫，反对民族压迫与精神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思想与实践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

1917年显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是当代主要的社会抉择，而在二十世纪不走更高级形式的社会组织：

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无法前进。列宁的这一基准性结论，今天同作出这一结论时一样，仍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俄国革命就象是成了从以往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人类最优秀人物对自由的向望的顶峰，成了他们的理想的体现。1917年汲取了作为我国历史特征的一些社会运动的力量——这些运动包括人民争取自主发展与独立的斗争，各个进步的民族运动，以及多次反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这一年还体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英雄们和蒙难者以及革命民主的激昂政论家们在精神方面的探索，也体现了我国文化界伟大活动家们在道义上的献身精神。

对于我国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是二十世纪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率领紧密团结的一组志同道合者走上了在俄国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正是这个伟大的列宁党发动了人民和人民中的优秀和正直人上去冲击旧世界。

十月革命成功的基石，是由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奠定的。这次革命中既有1月9日的痛苦教训和十二月起义的勇士们在莫斯科街垒上表现的大无畏精神，也有千千万万知名与无名的自由战士建立的功勋和苏维埃政权的雏形——第一批工人苏维埃的诞生。

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从1917年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成长起来的，而二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取得胜利的人民革命。在二月取得的胜利后，革命得到飞速的发展。革命的主角，是那些穿上士兵服装的工人与农民。1917年之春，显示了全民运动的威力。与此同时，这一运动的局限性、革命意识在这一阶段的矛盾性以及历史惰性的力量也都显露出来了。就是这些原因使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剥削阶级得以暂时把人民的胜利果实据为己有。

二月革命使十月革命获得了主要的武器——重建后的苏维埃政权。二月革命，这是在两个政权并存的极端复杂条件下取得的，现实民主主义的和在实践上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第一次经验。

二月革命就其使国家政权和平地转到劳动人民手中的可能性来说也是罕见的，可惜这种可能性由于种种历史条件而未能成为现实。二月革命是通往十月革命的道路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从参加二月革命的错综复杂和相互对抗的各阶级力量中，列宁天才地看到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四月提纲》是在那些历史条件下的科学预见，也是革命行动纲领的楷模。列宁不但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逻辑，而且也指出了这一过程的形式——经过苏维埃，经过布尔什维克化，而后的实质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认识他们自身斗争的意义和自觉地为自身利益而完成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是一段社会迅速变迁的时间，这时群众在政治上快速成长起来，革命及其先锋队——列宁党的力量不断得到加强。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那段时间，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政治理论发挥得特别有力，给人们留下了生动的革命思想与行动辩证法的有益的一课。党的领导显示了它有能力进行集体、创造性的探索，善于抛弃那些在昨天另一种情况下看来似乎不容争议和唯一可能的陈规与口号。可以说，列宁思想本身的逻辑，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活动——这一活动的特点是工作方式和方法的迅速改变，策略决定的灵活性和不寻常性，政治上的敢作敢为——这是反教条主义的、真正辩证的思维的光辉典范，也就是说，是新思维的光辉典范。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是这样思考和行动的，而且也只能这样思考和行动，尤其是在那些决定革命与和平、社会主义与进步事业的命运的转折、危机时刻。

再回过来说说1917年4月：列宁的关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纲领，对许多人来说——其中有朋友，也有敌人——都好像是一个乌托邦，甚至被看成近乎于异想天开。但是生活证明，只有这样的纲领才有可能成为并且的确成了革命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础，而实质上也就是成了拯救社会、防止民族灾难的基础。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17年7月的那些日子。我们党是多么痛心地被迫放弃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但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在一段时期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了苏维埃，

使它无力对付反革命。而列宁又是多么敏感地切握着革命的脉搏，多么天才地断定苏维埃重新复兴的开始；正是重建后的苏维埃在斗争过程中成为具有真正人民性的组织，因而能成为胜利的武装起义机构，继而又成为工农政权的政治形式。

所有这一切都不仅只是伟大革命历史的篇章。这一切还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些当代人，要切记共产党人的崇高义务是时刻身临事变，首当其冲，要善于果断决策，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对现时与未来的全部责任。

十月革命是千百万人的强烈意向的表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农民群众的历来愿望、士兵与水兵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多民族的俄罗斯人民对自由与光明的最强烈向往，都在其中结合起来。在不同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利益的关系中，布尔什维克党能找到主要的环节，从而能够把互相抵触的各种倾向与意向结合起来，并引导它们去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在它的头两个法令，即关于和平和土地的法令中作出的决定回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表达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十月革命那些日子还有一个极重要的、有原则性的教训。这在今天也值得一提。在当代有异常迫切意义的，就是列宁对生活和革命实践提出的下述问题的回答，即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模式”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创造性学说，不是现成单方和陈腐教条的堆积。马列主义与狭隘的教条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保障创新的理论思想与实践、与革命斗争进程本身之间的积极的互相作用。伟大的十月革命在这一点上就是最有教益的先例。

众所周知，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是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都不愿意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说什么革命的发生“不合常规”，不符合当时已形成的理论观点。在他们看来，俄国资本主义在1917年十月之前没有创造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与文化的先决条件。看来，回顾一下列宁曾如何回答这类批评我们的革命的人，是大有裨益的。列宁曾这样反驳他们：“你们说，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

那些教条式、学究式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无法理解这一学说的精髓——其中的革命辩证法。而正是这一辩证法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全部活动的突出特征。正是借助于这一辩证法，才在几乎可以说是可能和不可能的情况下建树了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这种政治和道义上的功绩，而这个和约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也拯救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生存。

再举一个例子。列宁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曾经确信革命的武装保卫者将是民兵部队。但具体条件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强加于人民的内战及外来武装干涉，要求采取一种新的对策。按照列宁签署的法令建立了工农红军。这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它在内战和反击外来武装干涉中立下了永放光辉的功绩。

那几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那时，社会主义存亡与否的严重问题明显地摆在面前。党团结并动员了人民起来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饥寒交迫、武装欠佳的红军战士打败了东西方帝国主义大力豢养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反革命军队。国内战争的火焰蔓延到全国各地，蔓延到每个家庭，根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和命运。在这一殊死的搏斗中，人民争取新生活的意志和千百万人的志愿胜利了。当时国家曾尽一切力量支援新建立的军队，在列宁提出的“一切都为了胜利”的口号下生活与行动。

英勇无畏的水兵和骑兵，新建立的红军的指战员和红色游击队员这些传奇式英雄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保卫了革命，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定也贯穿着极为深刻的革命辩证法。新经济政策使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的视野显著扩大了。

或者再拿这样一个问题来看。众所周知，列宁曾批评过“合作制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然而在人民夺取了政权的十月革命

后所形成的具体条件下，他则从新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是“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社会这一论点。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力量和胆识所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反映了革命学说的实质，而列宁精通这一辩证法。他认为：在建造新世界时，“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完，改做和从头做起”。

是的，我们要不止一次地做完和改做所开始的工作，进行长期和顽强的斗争，经历具有转折性和革命性的历史过程。而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前进的环境和条件。它们也改变了我们自己：使我们受到了锻炼、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对革命事业的成功充满了更大的信心。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估价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时，一次又一次地确信：我们在短期内完成的事业，别人需要用去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具有中等发展水平，工业高度集中，农民占大多数，封建主义残余，乃至封建制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残余根深蒂固的国家发生的。俄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虽然对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的四分之三的居民曾是文盲。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治国无方，国家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建设新生活没有先例，所以需要不断探索建设的方法。对于共产党来说，目的是明确的，即革命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苏维埃政权。列宁就领导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未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原则和准则，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在群众的热情的创造中、在俄国的纷繁复杂而经济又有多种结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完善起来。关于人民政权的形式、关于财产公有化的途径和界限、关于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关于建立起新的同志式纪律以及关于人在新社会里的地位与作用这样一些起初纯系理论上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并以现实的活生生的内容充实起来。

十月革命的主要意义就是建设新生活。这种建设一天一日也

没有中断过。为了建设，为了寻找通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即便是短暂的喘息时机也加以利用。

二十年代初标志着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极大飞跃。那几年成了社会革新、探求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联盟的最佳形式、创造实现劳动者一切利益的机制的真正的革命实验室。

党从在战争条件和经济遭到破坏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式的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方法转而采用更灵活的经济上有根据的影响社会实际情况的“常规”手段。实行新经济政策办法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我们现在越来越经常地重温列宁的最后几篇著作，重温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力求从这一经验中得到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切宝贵的东西。当然，在新经济政策和我们今天处于完全是另一发展阶段上所做的事情之间划等号，那将是错误的。二十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迫切目的是与个体农民建立联盟，而现在这种农民已不存在了。

但是，新经济政策也曾有更远的目标。当时提出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为此就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应当“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

在提到新经济政策的创造潜力时，看来应当再次谈谈粮食税思想在政治上和方法论上的丰富内容。当然，现在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当时粮食税的旨在保障工农结合的形式，而是这一思想本身所包含的解放群众的创造力，提高人的主动性，清除使“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受到限制的官僚主义障碍的可能性。

在列宁领导下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许多崭新的东西。

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制定并采用了计划经营的方法。国家电气化计划，是一种真正的发现，是世界经济思想与实践运动中的整整一个阶段。按照列宁的想法，它不只是宏伟的电气化计划，而且也是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协调结合”的方案，用现

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生产力的配置与发展的综合纲领。列宁把这一纲领叫做第二个党纲，叫做“恢复整个国家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

当时一种新的文化正在产生，它既吸收了过去的经验，也吸收了在革命的激发和鼓舞下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很大一批富有独创见解、个性鲜明和才华横溢的人物。列宁生前建立多民族苏维埃国家的那一最初阶段，不仅就其结果，而且就其经验与方法论而言，对我们来说永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列宁在想到有一天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那个时候，不可能勾画出未来社会的详尽的图案，而他也没有为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但是，通过建立大机器工业、实现广泛的合作化、吸收全体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根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原则组织国家机关的工作，通过“全体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在“不利用谎言和暴力”的情况下巩固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途径和方法——这正是一个崭新社会制度国家所应具有的特征。

在列宁的最后几篇理智的和充满激情的著作中，形成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观点和基本论点。这是党的巨大的理论财富。

全党和苏联人民对列宁的不幸逝世感到万分震惊。悲痛是无比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当时，这是人人都了解的。当时需要完成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党的领导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要依靠他的学说和遗嘱，找到最佳办法，在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具体条件下巩固革命成果并引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

历史向新的社会制度提出了强硬的最后通牒：要么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基础，存在下去并为人类提供建设公正社会组织的首创经验，要么消亡，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作为未成功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流芳百世。具有生命攸关、决定命运的重要意义的，首先是加快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问题。

列宁逝世后的20年代和30年代这一时期，在苏维埃国家的历

史上占居着特殊的地位。只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社会的根本改革。在这些年代里，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最佳方案和为建立新社会基础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来看，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人们极度紧张地顽强劳动、进行尖锐的多方面斗争的年代。工业化、集体化、文化革命、巩固多民族国家、确立苏联国家的国际地位、建立管理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新形式——这一切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而这一切都有过深远的影响。

几十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一时期。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具有历史性规模和历史性意义的丰功伟绩。前辈们的功绩和成就是我们赞叹不已和流芳万世的，就象这些功绩和成就本身那样。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时持批评观点回顾自己的历史，那只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虑走向未来的道路。

必须本着历史责任感和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过去作出评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是因为那一时期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有重大意义。第二、是因为那些年代是我国和国外多年辩论的中心内容，而在探求真理的同时，在国外往往也有人企图诋毁作为新社会制度的、作为相反于资本主义现实抉择的社会主义。最后，我们应当对这一时期和我们历史上的其它时期作出正确的评价，尤其是现在展开改革的时候，——这不是为了政治上去作清算或是发泄悲愤，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英勇业绩作出应有的评价，从错误和失算中吸取教训。

现在就来谈谈列宁逝世以后的20—30年代。尽管党和社会用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月革命后的著作武装，但探索途径的工作是异常艰难的，是在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辩论中进行的。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首先是能不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了这些斗争和辩论的焦点。理论界和实践家进行了探索：社会经济革新应该走什么方向、采取什么形式，如何在苏联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解决这些问题。

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必须以高度责任感完成建设性的实际工作。摆在面前的头一个尖锐问题，是国家工业化和经济改造，不解决这一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强国防就是不可思议的。这来源于列宁的直接指示，来源于他的理论遗产。从这一角度出发，同样是依据列宁的遗教，提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由此可见，这里指的是扭转乾坤的重大事业、重大问题和任务。我重复一下，虽然党在这些问题上有列宁的有关指示，但围绕它们还是展开了尖锐的争论。

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在革命以前和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几年，并不是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同意列宁的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此外，列宁的建议不可能包括建设新社会的所有具体问题。在分析当时的思想争论时，应当考虑到在象当时的俄国那样的国家里进行宏伟的革命改造，这本身就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国家处于历史性进军中，它的发展速度急剧加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受着迅速的深刻的改革。

思想斗争同经济、政治和人们的生活所有领域中的事件和过程交织在一起。这一斗争反映了所有阶级、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任务、历史传统和迫切任务的压力，也反映了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环境。

一句话，在这不寻常的万马奔腾的形势下辨清是非，找到唯一正确的方针，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思想斗争的性质，在不小的程度上因为党内领导的个人角逐而变得更加复杂。列宁生前就已存在的旧分歧，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抬头，而且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出现。众所周知，列宁对这种危险可能发生，曾提出过警告。他在《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强调指出，“这不是琐事，或者说，这是可能会有决定意义的琐事。”以后的许多情况正是这样。

小资产阶级本性在一些权威人物中占了上风。他们搞起了派系活动。这使党组织冷一阵热一阵，不能处理现实问题，妨碍了工作。党内的绝大多数人已清楚看到：他们的观点同列宁的思想

和计划背道而驰，他们的建议是错误的，并且会使国家偏离正确的方针，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分裂活动。

这首先是列·达·托洛茨基。他在列宁逝世后极欲掌握党内领导，充分证实了列宁对他的评价，说他是个过分自负而又惯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家。托洛茨基和托派人物否认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把赌注下在革命输出上；在国内政策方面，主张对农民要“抓得更严”，主张城市剥削农村，把行政和军事方法移植到管理社会的工作中去。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政治流派，它的思想家在左的假革命词藻的掩饰下，实质上采取了投降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是在全线上向列宁主义发动攻势。实际上，这指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革命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全民的彻底批判，揭露其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情况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勾结以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鲍·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而复杂起来。反对派的首领们知道他们占少数，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辩论强加于党，妄图分裂党的队伍。但归根到底党拥护党中央路线，反对反对派，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了反对派。

这样一来，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维护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战略和策略。党的政策得到了大多数党员和劳动者的赞成。尼·伊·布哈林、费·埃·捷尔任斯基、谢·米·基洛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埃·鲁祖塔克等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年代末就农民转上社会主义轨道的途径这一问题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实际上显示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和布哈林一派人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上对运用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所持的不同态度。

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条件要求把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作为迫切的任务。布哈林和他的拥护者在自己的筹划中、理论观点上实际上都对在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时间因素的意义估计不足。他们的立场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教条式的思维，取决

于对具体情况的不合乎辩证法的评价。布哈林本人和他的拥护者很快就承认了自己错误观点。

在这里回顾一下列宁给布哈林所下的评语是适宜的：“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极可贵的、极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全党所爱戴的人，但是很难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为其中包含有某种烦琐论的东西。（我看他从来就没学过，据我看也从来没有充分地理解过辩证法。）”生活又一次证明列宁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辩论反映了党的发展中的复杂过程。而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问题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曾是这一过程的特点。在这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中形成了工业化、集体化的概念。

在党及其中央的领导下，国内在短期内实际上重建了重工业，其中包括机器制造业、国防工业和在当时看来也算是现代化的化学工业，完成了国家电气化计划。这些光荣成绩的象征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库兹巴斯煤矿区，德聂伯水电站，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希比斯克联合企业，莫斯科和高尔基市的汽车制造厂，一些飞机制造厂，斯大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和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工厂，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厂，共青城，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和费尔干纳大运河，以及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其它伟大建设工程。那时出现了好几十个科学研究所，形成了广泛的高等院校网。

当时，党建议走前人从未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即不指望外国贷款，不等待靠发展轻工业得到的多年积累就马上发展重工业。对国家和人民来说，这条道路在那时的条件下虽然是异常困难的，但却是唯一可行的。这曾是革新的步骤，在其中群众的革命激情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组成因素。工业化一举便将国家引入了崭新阶段。三十年代末，苏联工业生产已占欧洲的第一位，居世界的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工业强国。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劳动功绩，自由劳动的功绩，布尔什维克党的功绩。

如果清醒地看待历史、考虑国内和国外的全部现实，那就不